

doi:10.3969/j.issn.1672-0598.2025.06.001

习近平文化思想标识性概念的学理、功能与意义

——以“两个结合”为中心的考察*

曾维伦,伍燕玲

(重庆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67)

摘要: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其标识性概念。标识性概念不仅是对科学体系的高度概括,也是区别于其他思想体系的重要标识。“两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标识性概念,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立场、原创性理论贡献与其独特的思想生成场域。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就要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标识性概念;两个结合;体系化;学理化

中图分类号:G120;D61;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25)06-0001-09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系统总结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就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结构完整,既有重大理论观点上的创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概念是科学体系的基石。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概念中,“两个结合”^①“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新的文化生命体”等概念都极具标识性,它们不仅是体系之网上的基础纽扣,而且是彰显体系特色的显著符号;它们既表征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守正创新,又体现了对党领导文化工作重要经验的理论升华;它们彼此联系,是有机联系的概念整体。“两个结合”的地位尤其特殊,“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其中“‘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1]33}。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必然产物,又赋予了“两个结合”新的内涵。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标识性概念的学理意蕴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也是构建一切学术理论体系的基石^[2]。概念的形成,标志着认识活动

* 收稿日期:2025-11-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4AKS001)“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化研究”;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4SKGH128)“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研究”

作者简介:曾维伦(1966—),男,重庆璧山人;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伍燕玲(2001—),女,重庆城口人;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曾维伦,伍燕玲.习近平文化思想标识性概念的学理、功能与意义——以“两个结合”为中心的考察[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2(6):1-9.

① “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

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标识性概念是在一般概念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其核心特征在于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规定性。判断一个思想理论体系的标识性概念,主要依据以下3个方面:一是其是否具有主体性和自主性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二是其是否具有主体性和自主性的思想内涵和文明内涵;三是其是否具有主体性和自主性的思想平台和理论空间^[3]。其中,所谓“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是指该理论观察世界、分析问题所要坚持的根本立场、价值取向和核心方法,概括的说就是其内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思想内涵”和“文明内涵”分别指其理论观点的构成,以及其承载的民族精神、文化基因与价值旨趣,是区别于其他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依据。“思想平台”和“理论空间”则分别体现该思想所能支撑和引发的理论议题、研究范式,以及其所开辟的理论领域和未来可能性。

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4],标识性概念的原创性正是这种“术语的革命”的集中体现。从更深层意义上讲,原创性是历史传承与理论突破的辩证统一,它既是对思想之“源”的回溯,也是对理论发展之“流”的开创。所谓“流”的开创,意味着在特定历史与文明语境中,通过理论思维的深化与升华,提炼出区别于以往的“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3],这正是“术语的革命”在“新”的意义上的重要表征。主体性是区别于其他物类的独立存在^[5],因而主体性是标识性概念的存在论维度。标识性概念的主体性能够明确界定其理论体系的边界,形成独特的研究对象、核心范畴与话语方式,从而与其他体系区分开来。标识性概念的主体性还体现为植根于特定的历史实践、文化传统和社会土壤的“文化根性”,从而呈现出不可复制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主体性标志着一个思想理论体系的成熟和独立,是其“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在理论形态上的显现。自主性是主体性的动态呈现与功能实现,是标识性概念生命力的体现。标识性概念的自主性意味着其所在的思想体系不依赖于外部理论框架,而是具备自我驱动、自我阐释与自我革新的内生动力与强大能力。缺乏自主性,理论研究就会陷入“照着说”的窠臼,就难以摆脱“以西释中”的依赖路径,最终在理论和话语上沦为“学徒”。相反,一个具备自主性的思想体系不仅能够运用自身原则和方法解释自身的发展逻辑、回应现实挑战,并为实践提供正当性辩护,还能够在与实践的持续互动中实现自我发展,通过不断地知识更新和理论创新,实现理论的自我扬弃与自我超越,从而保持对未来的开放性。综合以上论述,凡具有突出的原创性、鲜明的主体性与强大的自主性的概念,均称为标识性概念。

“两个结合”具有突出的原创性、主体性和自主性特征。首先,在原创性方面,“两个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认识,构成了实质性的理论创新。这一“结合”本身是一次结构性的、范式性的“术语的革命”,它突破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立化、二元化的思维定式,揭示了二者之间并非“拼盘”,而是存在内在融通、深度互动的“化学反应”,从而“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1]32-33},为理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开拓了全新的理论视野与广阔的实践空间。

其次,在主体性方面,“两个结合”巩固并彰显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中华文化主体性深深植根于中国独特的历史实践、现实国情与文明基因之中,体现了民族精神的独立性与文化自觉。一方面,“两个结合”着眼于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历史性变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坚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出发进行理论思考与学理创造;另一方面,它立足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文化根性”,强调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与滋养精神独立的文明力量。正是在现实基础与文明传统的双重支撑中,“两个结合”所构建的思想体系展现出不可复制的独特精神标识与文化品格,清晰地界定了其理论边界与价值依归,标志着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和文化上的独立自主。

最后,在自主性方面,“两个结合”展现出强大内生动力与未来指向性,是一个具有自我驱动、自我阐

释与自我革新能力的理论范式。在理论层面,它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语境中获得新的理论内涵与民族化的表达,促进理论的自主性发展和中国化时代化创新;在实践层面,它为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了根本遵循,展现出强大的现实解释力和实践引领力。尤为重要的是,“两个结合”通过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超越西方现代化路径的中国智慧与思想方案,展现出面向未来文明的开放性与创造性,从而凸显了其不依赖于外部框架、具有自我主宰能力的理论生命力。

二、“两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标识性概念的标识功能

“两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不仅体现出鲜明的原创性、主体性、自主性,还承载着独特的理论标识功能。

“两个结合”深刻标识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理解“两个结合”如何标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需要从“两个结合”与“六个坚持”^①的内在逻辑关系入手。概括而言:“两个结合”是贯穿“六个坚持”的一条主线,“六个坚持”体现了“两个结合”的精髓要义,“六个坚持”处处展示“两个结合”的理论气质和价值精华。“两个结合”作为一条主线,其精神实质和内在要求贯穿并体现在“六个坚持”的每一个方面。同时,“六个坚持”的每一个原则,都是对“两个结合”精髓要义的具体化、条理化呈现。“坚持人民至上”,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仁者爱人”等民本思想的创造性结合,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人民立场的价值取向;“坚持自信自立”,集中体现了经由“第二个结合”所确立的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创造;“坚持守正创新”,揭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态度,“守正”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创新”要求在实践基础上实现理论与文明形态的创造性转化;“坚持问题导向”,反映了“两个结合”的实践生成逻辑,“两个结合”本身就是为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而形成,并在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坚持系统观念”,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整体性、联系性与发展性的观点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通盘筹划”等观念的融通;“坚持胸怀天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中华文明“天下为公”理念的结合,使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着眼于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支撑。此外,“六个坚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还处处展示着源自“两个结合”的独特理论气质和价值精华。一是鲜明的主体性气质,“两个结合”的目的在于解决中国的问题,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主体性意识,通过“自信自立”得到了直接彰显,它强调了理论和实践的民族性与独立性;二是深刻的实践气质,“两个结合”始终立足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是这种实践性的方法论体现,强调理论必须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三是开放包容的气质,“两个结合”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吸收和融合的过程。它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更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借鉴全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守正创新”和“胸怀天下”充分展现了这种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宏大格局;四是鲜明的人民性,“两

^① “六个坚持”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世界观与方法论同为“六个坚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9-21.)

个结合”的最终价值旨归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人民至上”作为首要原则,确立了这一根本价值立场,是“两个结合”视域下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概言之,“两个结合”与“六个坚持”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联系。“两个结合”是方法论,是生成路径,更是贯穿“六个坚持”的“主线”;“六个坚持”则是世界观,是理论结晶,集中体现了“两个结合”的“精髓要义”,它们是“两个结合”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系统化表达。

“第二个结合”深刻标识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正创新的原则。“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重大理论创造^{[1]31-32}。同时“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6]。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话语体系的超越。

首先,“第二个结合”是在守正创新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升华。回顾党的历史,在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态度上,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文化方针,强调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7]。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强调要“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8]。江泽民强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9]。胡锦涛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10]。习近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立足新时代和实践要求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第二个结合”,在明确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突出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魂脉”激活中华文明的“根脉”,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实现生命更新,从而服务于文化强国建设。“魂脉”构成了思想文化的灵魂与核心,规定了文化建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而“根脉”则是思想文化的根基、土壤,“魂脉”和“根脉”缺一不可。这就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让我们正确且客观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11],“‘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11],进而科学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能够结合,以及结合的结果是什么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其次,“第二个结合”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鲜明的守正创新态度,是区别于以往党的历史上同类文化思想理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守住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同时强调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基因、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通过对“第二个结合”的系统展开,习近平文化思想纠正了社会上一些将传统文化绝对化,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的错误认知,进一步指明了正确的文化传承路径与文明发展方向。

最后,“第二个结合”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狭隘性与排他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倡导西方中心论,在思想文化领域衍生了一系列体现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文化帝国主义”^[12]“文明冲突论”^[13]“文明优越”^[14]等等。习近平文化思想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理念,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系统阐释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的中国主张^{[1]102};提出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明确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正确态度和原则^{[1]102}。习近平文化思想还倡导“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1]101},把交流互鉴作为文明发展的动力,鼓励各国在保持自身文明特色的基础上,相互吸收、借鉴优秀成果,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1]103}的多元共生的文明格局,打破了“文明优劣”的认知误区。

“两个结合”标识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独特的生成场域。如果一个思想文化体系缺乏主体性和自主性的思想平台和理论空间,就会陷入“照着讲”的困境,要么成为外来理论的简单注脚,要么沦为传统思想的重复叙述,最终丧失思想的原创力、解释力与生命力。“两个结合”标识着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拓了具有主体性和自主性的思想平台和理论空间,使其在新时代新征程大有可为。

一方面,从“第一个结合”来看,当代中国丰富而深刻的现实实践,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拓具有主体性和自主性的思想平台和理论空间提供了强劲动力。古今中外,文化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1]16}。文化思想总是在回答时代提出的特殊问题中形成,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展现生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但在信息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以及“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的背景下,文化领域仍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和现实问题。就国内而言,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不足,文化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依然突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尚待激活,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之间还存在结构性“剪刀差”。就国际而言,国际话语格局中“西强我弱”态势尚未根本扭转,我们在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时,常常陷入“有理没处说、说了也传不开”^{[1]98}的困境;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网络空间的文化渗透与反渗透、意识形态的斗争更加激烈。在数字化浪潮中如何守住文化阵地、维护文化安全,同时利用新技术赋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正是在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过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拓展其思想平台与理论空间,形成与时俱进的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生成主体性、自主性思想场域的内在动力。

另一方面,从“第二个结合”来看,它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拓具有主体性和自主性的思想平台和理论空间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思想支撑。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11]。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促成了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推动我们摆脱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认知束缚,使我们能够在文明坐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第二个结合”将“历史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连接起来,这种连接,疏通了文明传承的血脉,释放了被压抑的文化潜能,为我们打开了一片无比广阔、充满生机的文化空间。这使我们能够自信从容地回望五千年,从中发掘宝藏;能够立足当下,充分运用这些宝贵的传统资源;能够面向未来,以贯通古今的智慧和坚定的主体性姿态,探索并创造出属于新时代的、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今天,我们不再仰视外来文明,也不再轻视自身传统,而是以一种平视世界的姿态坚定文化主体性。从而,在对待外来文化时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实现真正的交流互鉴而非简单移植;在文化创新上激励原创性探索,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更立足于当代中国实践,大胆探索符合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引领未来发展的原创性理论和制度,展现中国文化的新气象与新作为。

三、“两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标识性概念的重要指导意义

充分发挥“两个结合”这一标识性概念的重要指导意义,要以“两个结合”为理论内核、方法指引、实践范式,深入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打下坚实基础;要主动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两个结合”的引领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要以“两个结合”的文明视野不

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社会现代化道路探索提供新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与中国力量。

坚持“两个结合”,就要不断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只有在体系化、学理化层面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把握,才能全面深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主要内容、核心要义与精神实质,从而更好地发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指导作用,提高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践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首先,以“两个结合”为理论内核,有助于实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整合。“两个结合”不仅是一个独立概念,更是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部内容的理论主线。通过深入阐释“两个结合”与“新的文化使命”“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等核心概念的内在联系,揭示其相互支撑、相互贯通的逻辑关系,能够构建出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的理论框架,凸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系统性与逻辑性。其次,以“两个结合”为方法指引,可以深度挖掘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理底蕴。“两个结合”要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审视新时代文化建设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融入文化建设的实践,使习近平文化思想具备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根基,有效避免了文化建设陷入唯心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的误区,筑牢了其学理的科学性根基。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厚的文化基因,使其学理化阐释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又有中华文化的民族厚度,进一步确立了自身的学理正当性与文化主体性。再次,以“两个结合”为实践范式,有助于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转化。“两个结合”不仅是一种理论主张,更是一种实践方法。通过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范式,能够科学分析文化建设中的现实问题,总结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实践经验,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从而彰显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贯通”的理论特质。最后,以“两个结合”为传播话语,可以显著提升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解释力、引领力和塑造力。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不仅要形成学术层面的理论成果,更要实现大众化表达的有效转化。越是“大道至简”的思想理论与话语,越便于传播^[15]。“两个结合”作为内涵深刻而又表达简明的标识性概念,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传播提供了重要载体,增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宣传普及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使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从而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转化为世界能理解的文化语言,可以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展现中国共产党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和方案,进一步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

坚持“两个结合”,就要推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两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其意义不仅体现在对习近平文化思想本身的阐释中,更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基础性、引领性作用。理论思维的进步对民族发展有着前瞻性意义。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6]。在新时代语境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实现民族复兴、推动文明进步的战略任务。习近平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时,明确提出“要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深入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17]298}。“两个结合”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思想根基,一方面,作为“魂脉”的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性质和科学方向。习近平指出:“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18]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两个结合”首要的、前提性的存在^[19],既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确立了人民立场、价值旨归和服务方向,又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确保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科学性、批判性

和实践性。另一方面,作为“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保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和民族特色。中国学术要从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进入到它的自我主张^[20],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要有主体性,要杜绝“以西方概念来指证中国的问题、套用西方概念来讨论中国的问题、甚至不加辨别地使用西方概念的现象”^[2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五千多年积淀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治国智慧,为解答当代中国问题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大量源于中华经典的概念、范畴和表述如“小康社会”“知行合一”等被激活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能够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脉”,使得构建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从基因上就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从而在精神上确立独立自主,构成区别于西方知识体系的根本标识。

坚持“两个结合”,就要锚定文化强国建设目标。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标识性概念的“两个结合”不仅体现为理论层面的价值,更在实践层面转化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路径。建设文化强国必须全面贯彻“两个结合”所蕴含的根本立场、核心原则和科学方法,即“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17]294}。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建设文化强国必须牢固树立人民性原则,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列宁曾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化“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21]。文化强国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这就要求我们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坚持文化惠民、文化亲民、文化育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使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促进人民文化创造相统一,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22];最后要以人民为文化强国建设的评判主体,“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17]295},人民是否能从文化建设中感受到精神滋养,是否能便捷获取优质文化资源,是否能通过文化浸润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检验文化强国成色的核心标尺。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就要充分挖掘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强国。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13]30}这就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的内在关联。文化强国不可能立足于历史文化荒漠之上,也不可能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化资源,我们必须立足自身的文化根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产生于不同时空,但在价值追求上高度契合。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梳理和现代阐释,使其从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转化为现实生活中活的文化基因;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保持其在新时代的生命活力和思想张力;要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彰显中华文化独特魅力,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参与人类文明对话,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出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通过创新对外话语体系和传播方式,让世界在理解中华文化中理解当代中国,在欣赏中华文明中认同中国道路。

坚持“两个结合”,就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106}。“两个结合”以其深邃的文明视野和开放的世界眼光,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两个结合”的实践价值,不仅在于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更在于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正在为人类社会现代化道路提供新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23]。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两个结合”的成果,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错误观念,开辟了现

代化的多样化道路。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模式因其早期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而被部分国家视为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标准、唯一模式。但世界历史的事实深刻表明,西方现代化的实质是“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24]23},是一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24]23}。西方现代化带来了个人主义膨胀、贫富分化加剧、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等弊病。“两个结合”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文明,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旨归,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24]22-23}。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界证明,各国完全可以基于本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现代化道路。这种经验本身,就是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巨大贡献,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崭新的选择。其次,“两个结合”所孕育的理论成果,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当前,人类社会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多重挑战。源自“两个结合”的许多理念,具有超越国界的普遍价值。诸如“天下为公”的胸怀,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东方智慧;“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的传统,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化解地缘政治冲突指明了方向;“道法自然、万物并育”的生态哲学,为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方案。这些思想资源并非中国对世界的单向输出,而是在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大势的基础上,通过“两个结合”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的、引发广泛共鸣的思想资源。它们以兼具哲学深度与实践可行性的方式,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
- [2] 王海峰. 打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识性概念——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史的考察[J]. 哲学动态,2020(4):5-14.
- [3] 孙正聿. 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J]. 中国社会科学,2024(7):38-51.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
- [5] 徐勇,任珽玉. “规定即否定”与“共在中此在”——概念构建的主体性与共享性[J]. 学海,2025(1):26-31.
- [6] 乔清举. 论“两个结合”及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意义[J]. 哲学研究,2023(12):5-13.
-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0.
- [9]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8.
- [10] 胡锦涛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65.
- [11] 习近平. 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3(17):4-11.
- [12] 杜敏. 西方左翼话语中文化帝国主义的深层逻辑与样态[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1):122-133.
- [13] 刘同舫. “文明三论”的理论构思及其价值审视[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1):26-33.
- [14] 赵坤,刘同舫. 从“文明优越”到“文明共生”——破解“西方中心论”[J]. 理论视野,2021(2):100-108.
- [15] 韩庆祥. 全面深入理解“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丰富内涵[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5(4):5-10.
-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7.
-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18]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9.
- [19] 贾英健,郭珂珂. “两个结合”对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原理性贡献[J]. 山东社会科学,2025(1):40-50.
- [20] 吴晓明. 中国学术如何走出“学徒状态”[N]. 文汇报,2014-12-12(T02).
- [21] 列宁全集:第1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7.

- [22] 李书磊.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N]. 人民日报, 2025-11-07(6).
- [23]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 人民日报, 2023-02-08(1).
- [2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The Theoretical Principles, Func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Defining Concepts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the “Two Combinations”

ZENG Weilun, WU Yanling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The key to promoting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academic interpret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lies in accurately grasping its Defining Concepts. Defining Concepts are not only a high-level summary of the scientific system but also an important symbol distinguishing it from other ideological systems. As a Defining Concep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the “Two Combinations” fully embodies the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ical stance, original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unique ideological formation field in this thought. To uphold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s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it is essential to advance the research and elucid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with a focus on its systematization and academic formalization. Furthermore, we must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hereby continuously 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the new form of human advancement.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Defining Concepts; Two Combinations; systematization; theorization

(责任编辑: 邓龙奎)